

张卉◎著

《中庸》学研究

张其成



四川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青年项目（批准号：16CZX025）阶段性成果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Supported by the Fundamental Research Funds for the Central Universities）项目（批准号：JBK170808）成果

张卉
◎ 著

《中庸》 学研究

四川
大学
出版社



四川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袁 捷
责任校对:张伊伊
封面设计:严春艳
责任印制:王 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朱熹《中庸》学研究 / 张卉著.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17. 12

ISBN 978-7-5690-1499-0

I. ①朱… II. ①张… III. ①儒家②《中庸》—研究
IV. ①B222. 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315755 号

书名 朱熹《中庸》学研究
ZHUXI ZHONGYONGXUE YANJIU

著 者	张 卉
出 版	四川大学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一环路南一段 24 号 (610065)
发 行	四川大学出版社
书 号	ISBN 978-7-5690-1499-0
印 刷	成都金龙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48 mm×210 mm
印 张	10.25
字 数	274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 ◆读者邮购本书,请与本社发行科联系。
电话:(028)85408408/(028)85401670/
(028)85408023 邮政编码:610065
- ◆本社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
寄回出版社调换。
- ◆网址:<http://www.scupress.net>

序 言

张卉博士先后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与四川大学，目前在西南财经大学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她是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庸〉学说史研究》的主持人。其学术之素养与努力，均为我所钦佩，而我又从事中国学术史及宋明理学教研工作多年，很高兴有此机会拜读张卉博士的大作，从中吸收一些教益。

钱穆先生曾说，在中国学术史上，儒学影响最大的有两个人，唐以前是孔子，宋以后则是朱子。朱子是“道问学”而“极高明”，他花了一生工夫在《四书章句集注》上，最后造成由“四书”为“五经”之阶梯，进而演变成以“四书”代“五经”的历程。“四书”以义理推衍为主，《论语》在汉代即已列为经书，《孟子》《大学》《中庸》则到了宋代才逐渐取得尊崇的地位。朱子认为学者当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读《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处”。由此可见，就“四书”学的难易，《中庸》是总其成的。因为《中庸》的“性与天道”与“诚明”之教，不仅是宋明儒学深化先秦孔孟儒学而来，也是宋明儒学发展之极致。因此张卉博士以“朱熹《中庸》学研究”为题，实为一有意义且重要之课题。

全书分为五章，分别是“宋之前的《中庸》研究”“朱熹《中庸》学的学术背景”“朱熹《中庸章句》成书过程研究”“朱熹《中庸》学的主要内容”“朱熹《中庸》学的历史地位和影

响”，层次分明、内容完备，使读者可以完整地理解朱子《中庸》学的主体价值及相关问题。本书不仅可以使我们对朱子《中庸》学片段性的认知豁然贯通，而且还提供了许多可以思考的理论层面、现实层面、个人生命修炼等方面的问题，这是本书的主要价值所在。书末附有“宋代《中庸》研究著述表”，更是为读者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参考。

此书是张卉博士在其博士论文上修改的撰述，未来她将进一步朝向整个《中庸》学的发展史探究，相信她必能更加完善此一在中国经学史、理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研究。

最后，我也略微谈一谈对本书一些商榷和改进之处：第一章如能略加二节：“中庸”字源史之研究和孔子论“中庸”或更佳。材料可从书中所论略作调整或增加。第三章题目“《中庸章句》成书过程研究”或可改为“朱熹《中庸》学与《中庸章句》形成之研究”，因为朱子著述还有《或问》《文集》、论学书信可能都与《中庸》学这个大题目有关。第四章中第七节与第八节或可另列一章。另外，“《中庸》学体系图”宜就书中内容的“本体论”、心性论、修身论、道统论等形成有层次的图示，而非平面并列式。最后，朱子论《中庸》是“性”“道”“教”一贯言之，其中的“教”实指“天人同等”。“参天地之化育”，亦为表彰《中庸》之深义，似乎可考虑加列一节说明或未来另作专文予以呈现。以上不成熟意见，谨供作者将来卓裁。

二〇一七年冬文昌詹海云谨识于蓉城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宋之前的《中庸》研究	(5)
第一节 《中庸》文献简述及成书问题	(5)
第二节 子思学派对《中庸》学说的发展	(11)
第三节 孟子对《中庸》学说的发展	(20)
第四节 汉至唐的《中庸》研究	(25)
本章小结	(46)
第二章 朱熹《中庸》学的学术背景	(48)
第一节 理学思潮的兴起	(48)
第二节 朱熹理学思想的学术渊源	(54)
本章小结	(68)
第三章 朱熹《中庸章句》成书过程研究	(69)
第一节 《中庸章句》成书之准备阶段	(70)
第二节 《中庸章句》之草成阶段	(97)
第三节 《中庸章句》之修正阶段	(100)
第四节 《中庸章句》之完善阶段	(114)
第五节 《中庸章句》在《四书章句集注》中编排的位 置及宋至清现存版本考略	(121)
本章小结	(131)
第四章 朱熹《中庸》学的主要内容	(132)
第一节 朱熹对《中庸》一书的界定	(132)

第二节	“本体”论思想·····	(135)
第三节	心性论思想·····	(191)
第四节	“道统”论·····	(212)
第五节	“慎独”论·····	(227)
第六节	“中庸”论·····	(235)
第七节	“尊德性”与“道问学”·····	(247)
第八节	朱熹《中庸》诠释中对“异端”思想的排斥 ·····	(253)
第九节	朱熹《中庸》学文献举隅及朱熹对儒家经典 与他人观点的引用举例·····	(258)
	本章小结·····	(270)
第五章	朱熹《中庸》学的历史地位和影响·····	(273)
第一节	朱熹《中庸》学的历史地位·····	(274)
第二节	朱熹《中庸》学对元、明、清三代《中庸》 学的影响·····	(278)
	本章小结·····	(301)
结 语	·····	(303)
附录：宋代《中庸》研究著述表	·····	(306)
参考文献	·····	(310)
后 记	·····	(318)

绪 论

“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是先秦儒学的代表作，《大学》《中庸》后被编入《礼记》，《论语》《孟子》是记述孔孟言论的重要著作，历来受到士人的重视。而真正将“四书”形成一体，代表孔孟之道和儒家正统，是朱熹的功劳。“四书”的形成是经过了二程、朱熹等人严格思考之后的历史、思想、文本的选择。朱熹等人要重建儒学，重构“道统”，最好的办法就是回到“轴心时代”去重探孔孟思想之实质，这样其学说就有了“源头活水”。朱熹摒弃汉唐的经学系统而回溯先秦诸子学，应该说是一种明智的选择。一方面，回归孔孟之学，固了“本”；另一方面，围绕“本”而建立起来的理学，是传承、是正统。朱熹在构建其心性论、性情论、天道论、工夫论等体系时所体现出来的思维路向和内容一定程度上是对先秦儒学的回归。这种回归是一种新的升华，真正意义上将先秦儒学理论体系化。朱熹建立起一套逻辑严密、条理清晰、内容丰富的儒家形上之学，是儒学、经学发展的高峰。

“四书”还反映了先秦儒家学说创立的一个过程，从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建立起儒家学术的大框架，为后世儒学发展的多种可能性奠定了基础。但“四书”总体说来是先秦儒家思想之大体，而非全部。如《易传》《荀子》就没有被列入“四书”之中。“四书”的心性路向对理学体系之构建，回应时代挑战，融通儒、释、道三教都有积极的意义。“四书”之中最能代表儒

家心性之学，也最能代表“四书”理论高度的就是《中庸》一书。《中庸》一书自诞生起，就凸显了儒学的心性维度，使《孟子》儒家心性之学的基本问题得以确立。但《中庸》在儒学、经学上的意义一开始并没有彰显出来，它被淹没在《礼记》之中，未受到普遍重视，这是汉唐思想大一统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汉唐经学的体制化遏阻了儒学的发展，儒学失去动力，动力的缺失成为儒学发展的最大障碍，儒学之危艰迫使儒者去寻求儒学发展的新方向。儒学既要保持自我本色，又要展现新风貌，就只能重新审视儒家经典，在自身张力范围内去探寻新的生命力。理学家们发现转向先秦儒家心性之学能让儒学焕然一新，更好地应对危机。《中庸》一书在宋代自然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中庸》在宋代的研究最为壮观，单独研究《中庸》的著述近百种，绝大部分是理学家的著述，有少部分是佛教徒的，还有少部分是兼通儒、释、道三教的。宋儒对《中庸》的研究涉及理学最基本和最重要的几个问题：“天理”论、心性论、“道统”论、“格物致知”论、工夫修养论，等等，可以说，《中庸》中所蕴含的丰富哲思在宋代最大限度地被诠释出来了。其中，程朱学派的《中庸》学说集中代表了宋代《中庸》研究的高度。《中庸》一书“广大精微”，其性质和内容决定了它能迎合时代之需要，顺应和促成了儒学的新转变。从儒学史、经学史的角度来看，宋代《中庸》研究推动了儒学、经学研究范式的转变，其实就是学术思维、学术方法的变化。它又与《大学》《论语》《孟子》一起改变了儒学、经学研究的重心：由经学体系转向了“四书”学体系，并且影响了元、明、清的学术发展。它还是沟通儒、释、道三教的重要桥梁。

本书以《中庸》为研究对象，时间轴为宋代，人物为朱熹，抓住了《中庸》学说史上最重要的一环。《中庸》放在宋代理学背景下，其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彰显，朱熹是宋代理学之集大成

者，也是《中庸》学之集大成者。通过分析朱熹《中庸》学，既能把握时代特色，又能把宋代《中庸》学的基本问题弄清楚，还能窥见后世《中庸》学说的发展逻辑。因此，这一选题是有意义的。

本书分为五章。第一章梳理宋之前的《中庸》研究，这就能从儒学史、经学史的角度去了解《中庸》学发展的状况，同时也能看清楚朱熹《中庸》学的价值和意义。第二章交代朱熹《中庸》学的学术背景，了解朱熹《中庸》学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中产生的，从中亦可以看出朱熹《中庸》研究的理学基调。第三章和第四章是本书的主体。第三章论述朱熹《中庸章句》的成书过程，通过对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将《中庸章句》的成书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中庸章句》成书的准备阶段，第二阶段是《中庸章句》的草成阶段，第三阶段是《中庸章句》的修正阶段，第四阶段是《中庸章句》的完善阶段。通过对《中庸章句》成书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到朱熹《中庸》学说由浅入深、由表象到成熟的过程。第四章论述朱熹《中庸》学的主要内容，共分九个小节，包括朱熹对《中庸》一书的定位、“本体”论、心性论、“道统”论、“慎独”论、“中庸”论、为学之方的争论、朱熹《中庸》诠释中对“异端”思想的排斥，以及对朱熹《中庸》学文献学举隅，论述力求尽可能全面和详细。第五章论述朱熹《中庸》学的影响和历史地位，分析了朱熹《中庸》学在《中庸》学史、“四书”学史乃至整个儒学史、经学史上的地位，还分析了元、明、清三代对朱熹《中庸》学的继承与反背。

本书的研究方法如下：

第一，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此方法既是历史学、哲学研究的基本原则，又是历史学、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我们在分析朱熹《中庸》学的过程中，不但要弄清朱熹《中庸》学说的演变过程，还要找出其发展的内在逻辑性。同时，还要将朱熹《中

庸》学置于儒学史、经学史中去看待其作用和价值。

第二，具体与抽象、归纳与演绎、比较与综合的分析方法。此三方法是学术研究最基本的方法。在对文献进行梳理的过程中，找出朱熹《中庸》学的相关材料，对这些材料进行归纳，抽象为一般性的概念、范畴，通过这些概念、范畴，又反过来证实和推演具体的问题。在阐释朱熹《中庸》学思想时，必然会涉及与汉唐和同时代学者《中庸》学说的对比，还会涉及朱熹《中庸》学与元、明、清时期《中庸》学说的对比。所以，本书采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比较的基础上综合分析朱熹《中庸》学的成就和影响。

第三，文献学与思想史相结合的方法。历史文献学着重从文本出发，立足文献资料去分析人物及其思想，这是学术思想研究普遍采用的方法。本书立足朱熹《中庸》文献及其他相关文献，尽可能全面地分析朱熹的《中庸》学说。思想史着重点是对理论发展和演变的研究。在对朱熹《中庸》学说进行探寻的过程中，将文献学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史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既能把握朱熹《中庸》学的主要内容，又能看清楚朱熹《中庸》学说发展的逻辑和其在学术史中的地位。

第一章 宋之前的《中庸》研究

《中庸》是《礼记》中的一篇，它开辟了儒学、经学发展的新方向：心性之学。对《中庸》的重视，始于子思学派内部，孟子又在子思的基础上发展和丰富了儒家的心性学说。汉唐时期，单独研究《中庸》的学者较少，多是将其置于《礼记》之中进行研究。汉唐《中庸》学主要遵郑玄之注，鲜有创新。《中庸》成书问题至今还未有定论，结合出土文献或可以揭开此问题的面纱。

第一节 《中庸》文献简述及成书问题

《汉书·艺文志》载《中庸说》二篇，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关于《中庸》研究的著述记载。《中庸说》二篇与《中庸》是何关系？学界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中庸说》二篇与《中庸》无关，颜师古、顾实持这种观点。“师古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亦非本礼经，盖此之流。’”^①顾实言：“以《志》既有《明堂阴阳》又有《明堂阴阳说》为例，则此非今存戴记中之《中庸》明也。”^②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庸说》二篇与《中庸》关系密切，是对《中庸》的注解，并指出至少在汉

① 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② 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49页。

代，学者们已经开始注意《中庸》，姚振宗与张舜徽持这种观点。姚振宗在《汉书艺文志条理》一书中讲道：“颜注以《礼记》之外别有此《中庸》之书，不知此乃说《中庸》之书也。”^①张舜徽指出：“今《礼记》中之《中庸》，相传为子思所作。郑玄《三礼目录》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孔子之孙子思伋作之，以昭明圣祖之德也。’古书有单篇别行之例，《汉志》著录《中庸说》二篇，知《中庸》单行甚早，已有为之讲说其义者矣。惜不知为何人所作，其书又不传于后世也。可知重视《中庸》而表章之，初不自宋儒始。”^②两种观点都有道理，惜《中庸说》二篇已佚，难以考证。但我们可以作一番推测，《中庸》由子思所作，是战国时期对孔子思想的巨大发展。孔子死后，儒分为八，而八派之一的子思之学在战国时期乃是显学，影响很大。秦世坑儒，但儒学的传承并未就此断裂。加之《中庸》篇幅短小，又是儒家最具哲理性的代表作之一，信仰儒家学说的士人肯定对《中庸》耳熟能详，对之进行解读是说得通的。故《中庸说》二篇是对《中庸》之注解，可能性较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也出现了研究《中庸》的单行本，如戴逵的《中庸注》、戴颙的《中庸传》、梁武帝的《中庸讲疏》，以及张绾、朱异、贺琛的《私记制旨中庸义》，但皆散佚。唐中叶之后，《中庸》的意义充分展露，成为对抗释、道冲击，提升和创新儒家理论最重要的儒家经典之一。著名文学家、思想家韩愈著《中庸说》，已佚。从文献记载看来，单独研究《中庸》的著述大量集中在宋、明、清三代。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中庸》的研究基本分为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庸》的单独研究，第二种情况是置于《礼记》之中的研究。相比较而言，第二种情况比

① 陈国庆编：《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47页。

②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湖北：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9页。

第一种情况要多。宋、元、明、清各朝代的研究主要分为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中庸》的单独研究，第二种情况是置于“四书”之中的研究，第三种情况是置于《礼记》之中的研究。朱熹《中庸》学是《中庸》学史上最重要的一环，朱熹之后的《中庸》学既有对朱熹《中庸》学的继承，亦有对其的反背。但更多的是继承和传扬，发展和创新的方面显然不足。

唐中叶之后，《中庸》的意义充分展露，怀疑也随之而生。欧阳修认为，《中庸》之语“异乎圣人”，未能符合孔子的思想实质，故“疑其传之谬”^①，从此便拉开了《中庸》成书问题探讨的序幕，至今还没有定论。

《中庸》成书问题是《中庸》研究的首要和基础问题。就目前学界讨论而言，此问题的争论主要集中在《中庸》成书时代、作者谁属以及文本结构问题上。主要有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承认《中庸》成于战国，乃子思所作，司马迁、郑玄、沈约、韩愈、李翱、二程、朱熹、黎立武、陈襄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第二种观点认为《中庸》成书晚于子思，非子思所作，为秦或汉代的作品，欧阳修、叶适、崔述、袁枚、叶西、俞樾，以及现当代

^① 欧阳修在《问进士策三首》中曰：“礼乐之书散亡，而杂出于诸儒之说，独《中庸》出于子思。子思，圣人之后也，其所传宜得其真，而其说有异乎圣人者，何也？……而《中庸》曰‘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夫尧之思虑常有失，舜、禹常待人之助，汤与孔子常有过。此五君子者，皆上古圣人之明者，其勉而思之犹有不及，则《中庸》之所谓‘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者，谁可以当之与？此五君子者不足当之，则自有天地已来，无其人矣，岂所谓虚言高论而无益者与？夫孔子必学而后至，尧之思虑或失，舜、禹必资于人，汤、孔不能无过，此皆勉人力行不息，有益之言也。若《中庸》之诚明不可及，则怠人而中止，无用之空言也。故予疑其传之谬也，吾子以为如何？”欧阳修认为，《中庸》之语与圣人的事迹未能相符，故“疑其传之谬”。见欧阳修：《问进士策三首》，《欧阳修全集》卷四十八，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第675~676页。

钱穆、晚年的冯友兰、劳思光、廖焕超等人秉持此说^①；第三种观点是以文本结构分析为基础的，对《中庸》文本的整体性提出质疑，认为《中庸》部分出自子思，这种观点始于宋代学者王柏^②，目前这种观点在学界影响最大，早年的冯友兰、徐复观、郭沂、日本学者武内义雄等都持这种观点^③；第四种观点认为

① 清代崔述的观点最有代表性：“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于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于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观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后，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托之于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见崔述：《洙泗考信余录》，《丛书集成初编》本，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56~57页。

② 宋代王柏云：“常觉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一日偶见《汉书·艺文志》有曰‘《中庸说》二篇’，颜师古注曰‘今《礼记》有《中庸》一篇而不言亡’，其一也，惕然有感，然后知班固时，尚见其初，为二也，合而乱之，其出于小戴氏之手乎，彼不知古人著书未尝自名其篇目，凡题辞皆后人之所分识，徒见两篇之词义不同，遂从而参伍错综成就其总题，已天赋为命，人受为性，所赋所受本此实理，故‘中庸’二字为道之目，未可为纲，‘诚明’二字，可以为纲，不可为目。”王柏认为今本《中庸》乃由两部分组成，即“中庸”和“诚明”，后学将之合二为一。见王柏：《题跋·古中庸跋》，载《鲁斋集》卷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③ 郭沂先生在对《礼记》的性质与成书问题的分析上，通过对《中庸》与《论语》的文本、内容的比较，得出了一个新的观点，此观点在学界引起了较大影响。他认为，《中庸》也是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论语》佚文，分别是第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六章大部分（最后一句归第二部分）、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的部分（第一句至“礼所生也”为第一部分，其余归第二部分），剩下的归第二部分，乃子思所作；郭先生还从语言文字发展的角度指出第二部分才是子思所作。见郭沂：《中庸成书辨正》，载《孔子研究》1995年第4期。冯友兰的划分，见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第447~448页。徐复观的划分，见徐复观：《中国人性史论·先秦篇》，载李维武编：《徐复观文集》第三卷，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5页。武内义雄的划分，见武内义雄：《子思子考》，载江侠庵编译：《先秦经籍考》中册，上海：商务印书馆，1929年，第120~122页。

《中庸》是思孟学派的集体创作，杜维明先生持这样的观点^①。

郭店楚简和上博竹简或可以为解决《中庸》的成书问题提供相关文献资料。据考证，郭店楚墓^②年代约为公元前四世纪中期至公元前三世纪初期，上博简约在公元前三百年左右，两者均属于战国中晚期。郭店简主要是道家和儒家学派的作品。《汉书·艺文志》记载“《子思》二十三篇”^③。学界认为，郭店简中多篇与子思相关，很可能就是《子思》二十三篇散佚之文，这也证实

① 见郭齐勇、郑文龙编：《杜维明全集》第三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4年，第391页。

② 刘宗汉认为，郭店一号楚墓的墓主人应是楚宣王、威王、怀王、顷襄王其中一人的老师。（刘宗汉《有关荆门郭店一号楚墓的两个问题——墓主人的身份与儒道兼习》，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390页。）姜广辉推测，墓主人有可能是楚顷襄王的老师陈良。（姜广辉：《郭店一号墓墓主是谁？》，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第398页。）

③ 张舜徽：《汉书艺文志通释》，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第100页。

了“儒分为八”之子思学派的存在^①，同时也为我们研究子思学派提供了重要的史料。《中庸》与诸篇出土作品有着重大关系。笔者通过对《五行》《性自命出》^②《成之闻之》《六德》《语丛二》等篇与《中庸》相关范畴进行分析得出，这几篇竹简乃《中庸》思想之进一步发展，为子思学派的作品。楚简年代为战国中晚期，这些作品应在战国中晚期或者稍前就已经形成，又因为其内容重哲学、心性，与《中庸》一脉相承。我们从竹简便可推

① 廖名春指出：“郭店楚简十种儒家的著述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孔子之作，它们是《穷达以时》《唐虞之道》《尊德义》。第二类是孔子弟子之作，它们是《忠信》《成之闻之》《六德》《性情》。其中《忠信》可能是子张之作，《性情》可能是子游之作，《成之闻之》《六德》可能是县成之作。第三类是《子思子》，为子思及其弟子所作，它们是《缁衣》篇、《五行》篇、《鲁穆公问子思》。其中《缁衣》篇与《五行》篇可能为子思自作，《鲁穆公问子思》当成于子思弟子之手。”（廖名春：《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第69页。）姜广辉指出：“《郭店楚墓竹简》中《唐虞之道》《缁衣》《五行》《性自命出》《穷以达时》《求己》（原题《成之闻之》前半部）、《鲁穆公问子思》《六德》诸篇为子思所作。”（姜广辉：《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载《中国哲学》第二十辑《郭店楚简研究》，第88页。）王葆玟指出：“墓中的竹书有八篇可肯定是《子思子》一书的资料来源，由长期延续的子思学派所陆续完成。其中《缁衣》是子思本人所作，《鲁穆公》《五行》《性自命出》《尊德义》《成之闻之》五篇是子思弟子的手笔。《唐虞之道》和《六德》是子思学派的极富代表性的作品，前者约撰于孟荀之间，后者则撰于公元前278年白起拔郢之后。”（王葆玟：《郭店楚简的时代及其与子思学派的关系》，载《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44页。）三位学者对具体篇目作者的认定有一定差异，但都承认竹简中的诸篇与子思密切相关。儒分为八之后，子思一派是战国时期发展较好，影响较大的学派。

② 郭店简的《性自命出》篇和上博简的《性情》篇结构不同，文字也有所差异，但思想内容并无二致。李零先生认为，无论是郭店简还是上博简，用《性情》作题目比《性自命出》好，但《性》作题目是最好的。郭沂先生则把上篇作《有性》，下篇作《求心》。愚以为，从此篇内容看，上源“天”“命”，下演“性”“情”“心”，又究“物”“悦”“故”“义”“势”“习”“教”等说，所以《性自命出》篇内容是庞大的，不能单由几个哲学范畴来概括。此篇很能代表子思学派的理论高度。先秦典籍的书名多为后学所加，书名不一定能完全表述文本的主旨，《中庸》也不例外。